

论徽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琳琦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徽商研究不仅是徽学研究中的基础领域,也是明清商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徽商研究硕果累累,学界就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主要地域、主要方式、资本积累,以及徽商的特色等,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意见。但徽商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如徽商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徽商衰落与近代转型、徽商精神的总结与凝练等等,仍然是众说纷纭,未有一致的认识。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进行梳理,并略陈管见。

关键词: 徽商兴起与发展;徽商精神;徽商衰落与近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 K248;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4)02-0114-08

Discussion on the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Huizhou Merchants

LI Lin - q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Huizhou merchants is not only the basic field of Huizhou studi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commercial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nce the 1980's, the research of Huizhou merchants has gotten a rich harvest. Academic have formatted general agreement on the main operating region, the main way,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izhou merchants. But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Huizhou merchants, such as the reason for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Huizhou merchants, the fading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s, and summary and concise the spirit of Huizhou merchants, and so on, are still widely divided. For such problems, there is no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at prese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ort out these problems and offers some opinions.

Key word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Huizhou merchants; the spirit of Huizhou merchants; the fading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s

徽商的专题研究,如果从 1947 年傅衣凌先生发表的《明代徽商考》^①算起,迄今已有 67 年的历史。60 多年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徽商研究硕果累累,已出版著作 10 余部,发表相关论文 1000 余篇;徽商研究的综合性论著,除 20 世纪 50 年代[日]藤井宏的《新安商人的

^①傅衣凌《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第 2 期,1947 年 6 月;后收入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中,改名为《明代徽州商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转引自《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 页。

研究^①外,主要有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②,王廷元、王世华的《徽商》^③和冯剑辉的《近代徽商研究》^④等。

通过研究,学界已基本弄清徽商发展的脉络,并就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主要地域、主要方式、资本积累,以及徽商的特色等,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意见。但徽商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如徽商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徽商衰落与近代转型、徽商精神的总结与凝练等等,学界仍然是众说纷纭,未有一致的认识。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进行梳理,并略陈管见。

一、关于徽商兴起与发展的原因

徽州“介万山之中”,位于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逐步形成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表现出自然境界和分水界这样两个地理特征。”^⑤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府级行政区,明清时期,形成了“十室九商”、“足迹几遍禹(宇)内”、“比屋素封”,并执商界之牛耳的地域性商帮——徽商。

对徽商兴起与发展原因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明清徽州的方志以及其他相关文献,都是把地狭人稠、生计所迫看成是徽人经商的唯一原因或根本原因。嘉靖《徽州府志》卷2《风俗》云“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万历《歙县》传卷10《货殖》云“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康熙《徽州府志·风俗》、道光《徽州府志·风俗》和明清徽州其他县的县志亦有相同的记述。明人王世贞说“新安僻居山溪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世不中兵革,故其齿日益繁,地瘠薄,不给于耕……故其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⑥;明人归有光说“歙山郡,地狭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贾”^⑦;明人唐顺之说“新安土硗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闾閻家不悛为贾”^⑧;清初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转引明代“安徽地志”云:徽郡“田少而直昂,又生齿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⑨甚至民国八年,吴日法在《徽

商便览·缘起》中亦云“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山多而地少。……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以起。……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⑩。日本学者藤井宏说“地方志的作者认为,由于徽州土地硗确,不适宜农业,同时因人口增长,这是造成徽人经商的根本原因。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⑪

20世纪40年代后,学者们又开始从“社会的因素”来探寻徽商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正如傅衣凌先生所说“我们固然承认‘人多地少’是徽州多商贾的一个理由,但不把它作为唯一的原因,基本的应认为属于社会的因素。”^⑫这“社会

①[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原连载[日]《东洋学报》第36卷第1—4号,1953年6、9、12月和1954年3月出版;转引自《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第169—170页。

②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日]斯波义信《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3页。

⑥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1《赠程君五十叙》,明万历五年王氏世经堂刊本。

⑦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8《例授昭勇将军成山指挥使李君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⑧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15《程少君行状》,四部丛刊本。

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2《江南二十》,四部丛刊三编本。

⑩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7页。

⑪[日]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原连载[日]《史学杂志》第54编第5—7号,1943年5、6、7月出版;转引自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第295页。

⑫傅衣凌《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第2期,1947年6月;后收入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中,改名为《明代徽州商人》。转引自《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第8页。

的因素”根据学者们的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数端:其一,徽人经商具有地理优势,“从地理上看,徽州适处东南经济要区的苏浙的中心,交通便利”^①;其二,“徽州地区物产丰富,尤其是土特产很多,所以可以与各地以通有无,这就提供了商业资本活动的物质前提”^②;其三,徽州人有从商的经验,“以前徽州人为贩卖自己的手工业品,曾获得不少商业上的经验,现在则为这许多的有利条件,更容易诱导徽人从事于商业的活动”^③;其四,与明中叶的盐法变革有关,“随着银的流通,而在明中期所成立的运司纳银开中制,应是新安商人作为雄飞中国商业界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④;其五,是官商结合,“作为新安商人雄飞中国商业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在于新安精励的学者和廉洁的官吏辈出,他们出游四方,并在所到之处保护和诱导徽州籍的商民”^⑤。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有些学者又从文化和观念的角度来分析徽商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唐力行先生认为“徽商的兴起得力宗族势力。徽商在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⑥王廷元先生认为,徽商恪守儒家的义利观,而儒家的义利观,“它对于封建性的徽州商帮的发展,确曾起到过明显的积极作用”,“儒家义利观对徽商发展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提高了徽商的信誉,使他们能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其次儒家义利观,巩固了徽商内部的团结,有利于徽州商帮的发展。……第三,儒家的义利观促进了徽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⑦栾成显先生认为“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造就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由上述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即徽商本身所具有的素质,无疑是一种优势,它使徽商在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因此不能说,由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所形成的具有优势的人力资本,是徽商兴起和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⑧

以上从三个时期就学界对徽商兴起与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扼要的归纳。的确,徽商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多维度的、多样化的,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余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我们认为,徽商的兴起与发展是自然地理因素、社会经

济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自然地理因素,举其要者有二:其一,人地矛盾的加剧是徽人从商的直接动因。明清时期,徽州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山多地少、土地瘠确的徽州此时已不能养活因社会稳定而日益增多的人口。于是,经营商业,力图向外发展就成了徽州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选择^⑨。其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徽人从商提供了便利。徽州毗邻的苏南、浙东、赣北和皖南皆为经济发达之区。崇山峻岭挡住了徽人对外的陆路交通,但境内众多的水系,如新安江水系、阊江水系、乐安江水系、水阳江水系、青弋江水系等等,皆可通舟楫,这为徽人与外界的联系提供了方便。从宋代起,通过水路,徽州以其土特产、手工艺品同邻近的浙江、江西、江南地区交换粮食的贸易往来就已经十分频繁^⑩。

社会经济因素,举其要者有三:一是明中叶以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赋役折色制度的推行,为徽人经商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明中叶后,农业和手工业的分

①③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转引自《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第 10 页。

②陈野《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安徽史学通讯》1958 年第 5 期。

④[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原连载[日]《东洋学报》第 36 卷第 1—4 号,1953 年 6、9、12 月和 1954 年 3 月出版;转引自《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第 169—170 页。

⑤[日]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原连载[日]《史学杂志》第 54 编第 5—7 号,1943 年 5、6、7 月出版;转引自刘森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第 295 页。

⑥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⑦王廷元《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

⑧栾成显《经济与文化互动——徽商兴衰的一个重要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

⑨参见李琳琦《传统文化与徽商心理变迁》,《学术月刊》1999 年第 10 期;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41 页。

⑩参见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第 41—42 页。

工、手工业内部地域和行业的分工、农业地域的分工都在进一步扩大,江南市镇勃然兴起,城市日益繁盛、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赋役折色制度正统年间施行,其后“概行天下”。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的繁荣,从而为商人、也为徽商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极好的经商条件^①。二是明中后期的盐法变革成为徽商发展的加速剂。张海鹏先生认为,明中后期,“徽州商人两批涌进两淮,都与封建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盐法变革有密切的关系。”^②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将“纳粮开中”改为“折色开中”,于是徽商利用地利优势,成批地进入扬州、仪征、淮安等地从事盐业经营;万历四十五年(1617),户部尚书李汝华,盐政大臣袁世振、龙遇奇等又率先在两淮实行“纲运制”,即将原来分散运盐的运商组成商纲,结纳行运,“纲运制的实施,又一次吸引了众多的商人聚集于两淮这个全国最大的盐场,尤其是徽州商人。”^③“折色开中”的推行和“纲运制”的实施,不仅使徽商占据了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优势,而且获得了垄断两淮盐业运销的世袭特权,从而导致徽商“雄飞中国商界”。三是明中叶后,徽州“科名最盛”,一大批徽州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他们成为徽商的政治代言人和利益保护伞。这些在中央和地方任职的徽州子弟对“凡有关乡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画,务获万全”^④,在施政和议事中竭力保护徽商利益。有这些仕宦子弟的保护和关照,徽商的商业贸易活动自然比其它商帮要顺利许多^⑤。

文化心理因素,举其要者亦有三:第一,是改造传统价值观,消除徽人从商的心理压力和思想障碍。明中叶后,徽人开始对士(儒)贵商贱、农本商末的传统价值取向进行改造,宣传“贾不负儒”、“士商异术而同志”,以及“士农工商,皆为本业”的新的价值观。新的价值观的宣传和接受,减轻了徽人从商的心理压力,这是明清徽州商业社会形成的思想基础^⑥。第二,是充分利用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商帮内部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徽人经商往往是父子兄弟、亲戚知交结伴而行,或者是同宗同族、同乡同邑合伙经营,并在经营地建会馆、公所作为“互通声气”、“互帮

互助”之所,形成了颇为明显的行业血缘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正如明末歙县人金声所说的:“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天下……夫两邑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⑦这是徽州商业社会形成的组织基础。第三,是因为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色。绝大多数徽商在经营活动中都能恪守儒家的诚、信、义、仁的道德规范,在社会活动中热心公益和慈善,弘道义、勇担当。从而使徽商赢得了知名度和信誉度,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氛围。这是徽州商业社会形成的道德基础。

二、关于徽商精神的总结与凝练

精神虽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但它是在社会存在中产生的,同时它又会作为一种力量、一种导向,指引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一个民族的精神反映出这个民族的性格,是这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同样,一个群体的精神也反映出这个群体的特性,是这个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徽商之所以能够在明清时期崛起称雄,并执传统商界之牛耳长达三四百年之久,徽商精神的作用毋庸置疑。

学者对徽商精神的系统总结,较早的应属王世华先生,他在其所著的《富甲一方的徽商》中,将徽商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同舟共济、以众

^①参见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12页。

^{②③}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159、159—162页。

^④《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许氏闾族公撰观籓园公事实》,清乾隆刊本。

^⑤参见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第276—281页。

^⑥参见李琳琦《传统文化与徽商心理变迁》,《学术月刊》1999年第10期。

^⑦金声《金太史集》卷4《与歙令君书》,乾坤正气集。

帮众的和协精神;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①。

其后,又有不少学者在其论著中对徽商精神进行了各自的总结和表述。刘伯山先生把徽商精神的内涵诠释为四个方面:不甘穷困,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不怕挫折,执着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②。

朱万曙等先生把徽商精神总结成十二个方面:徽骆驼——徽商的吃苦精神;山外有山——徽商的开拓精神;诚信的收益——徽商经营的大方略“贾而好儒”——徽商的文化追求;坚守伦理——徽商对传统的依赖;期望子弟——徽商对教育的重视;一人唱,众人唱——徽商的群体意识;赢得社会——徽商的人生价值观;文化投资——徽商的另一种眼光;自卑与自重——徽商的矛盾心理;与天子交——徽商的莫大悲哀;回归田园——徽商的人生归宿^③。

菲元先生把徽商精神概括为七个方面:崇文向善、务实求真的人本精神;勤俭努力、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重义诚信、有道经商的敬业精神;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以众帮众、协力同心的团队精神;仁心济世、爱乡爱国的奉献精神^④。

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振徽商雄风”课题组将徽商精神的本质内涵概括为开放、诚信、进取、创新、和协五方面,具体表述为:眼光向外、经营在外的开放精神;以德治商、讲求信誉的诚信精神;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相互扶植的和协精神^⑤。

以上的列举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几乎都用了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开拓、进取、竞争、和协、诚信、爱国,用词上没有特色;其二,都尽可能的扩大、抬升徽商精神的内涵,最后总结出来的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几无二致,缺乏针对性、没有特点。

徽商是什么?徽商是指明清徽州一府六县形成的商人群体。徽商精神是什么?徽商精神是指徽商这个群体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风尚、信念、情怀等意识形态。总结徽商精神,我

们认为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要明确对象。它是指徽商这个特定群体的精神,不能泛化;二是要明确依据。总结徽商精神的依据是徽商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徽商的实践活动。三是要继承发展。前人已总结,并被广泛认可,可是精当的,我们要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再实事求是地进行当代诠释。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认为,徽商精神可以总结和表述为“徽骆驼”的进取精神和“贾而儒”的人文精神。简称“徽骆驼”和“贾而儒”。

第一,“徽骆驼”的进取精神。“徽骆驼”是在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徽州籍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总结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为江苏溧阳新安同乡会题写了“我们是徽骆驼”的条幅;1953年,胡适又为台湾绩溪同乡会题写“努力做徽骆驼”的条幅。经胡适的宣传,“徽骆驼”一词逐渐深入人心,“骆驼”也就被誉为徽州人、徽商精神的象征。我们认为,胡适用“徽骆驼”来比喻徽州人和徽商是贴切而精当的,它所蕴含的内涵也是丰富而深刻的。“骆驼”首先代表的是一种进取的精神,骆驼只有一直前行,遇到挫折不停顿,才能走向成功。在这种进取的精神里,同时还蕴含着成功的信念,这是生存的信念和发展的信念,骆驼只有走出沙漠才能生存、只有遇到绿洲才能发展;还蕴含着协作的意识,骆驼穿越沙漠一般都是结队而行,这里有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骆驼的关系、骆驼与骆驼的关系,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胜困难。而这些和徽州人、徽商无疑是高度契合的。徽人经商,是在“地狭薄不足以食”情况下的生存和发展的选择,他们不仅要勇于走出丛山,而且要有成功的信念;这种信念,需有“一贾不利再贾,再

①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第191—216页。

②刘伯山《徽商精神》,《安徽日报》1999年5月13日。

③朱万曙、谢欣《徽商精神》,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菲元《徽商精神——徽州文化之精髓》,参见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搜集的《徽商论文》,2004年。

⑤吴克明主编《徽商精神——徽商研究论文选(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①的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的支撑。但光有成功的信念和进取的精神还不够,因为古代交通不便、社会治安不好、排外观念极强,一人独闯商海、侨寓他乡,无疑不切实际、也很难生存,于是徽人又利用故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特别是宗族血缘关系,结成从商群体、团结协作、共求发展,所以顾炎武在《肇域志》第三册中说“新都(徽州)人……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馐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②。

第二,“贾而儒”的人文精神。明清文献中,把徽商的“商(或贾)”字与“儒(或士)”字,联系在一起的论述很多。如:明休宁商人汪坦,“虽托游于货利之场,然非义弗取。其遇物也咸率其直而济之以文雅,此其商而儒者欤!”^③明歙县商人郑朝霖,“事贸迁,驰心猗顿,托迹计然……虽商而儒。”^④明代歙县商人黄长寿,“父老,去之贾。以儒术饬贾事,远近慕悦,不数年货大起。……翁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儒行……。”^⑤明歙县商人江世鸾,“恂恂雅饰,贾而儒者也。……名士乐与偕游。”^⑥清代休宁商人金鼎和,“躬虽服贾,精洽经史,有儒者风。”^⑦清代休宁籍著名学者戴震说“吾郡(徽州)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⑧这种“贾而儒”或“商而儒”,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所表达的就是徽商的人文精神。徽商的这种人文精神,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崇文重教的风尚。徽商热爱文化教育,不仅自己喜读书、有文化,而且不吝资财,亟置塾学、广设义学、捐修官学、倡建书院、捐输束修膏火、捐输科举资费、藏书刻书、兴办雅集,有力地促进了徽州本土和其侨寓之地的文化教育的发展^⑨。二是恪守儒家的道德。徽商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视为立身行事之本,在经商过程中,大都能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行事“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⑩。三是社会担当的情怀。他们乐善好施,在修桥筑路、赈灾济困、扶危救难等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上不遗余力,反映出徽商的社会担当情怀^⑪。

三、关于徽商衰落与近代转型

关于徽商衰落的问题。学术界较早研究徽

商和徽学的资深前辈学者,如[日]藤井宏、叶显恩、张海鹏、王廷元、王世华等的认识几乎是一致的^⑫,认为清中叶后,特别是道光以后,随着淮盐由纲改票打破了食盐的垄断销售制度,以及咸、同战争的破坏和外力冲击下的经济转型等因素的影响,称雄三四百年的徽商到近代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

但20世纪90年代后,有个别的学者开始质疑以上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史学界一般认为徽商在清朝道光年间开始衰落……但如果考察一下民国时期的商界,我们看到徽商在传统的活动区域以及经营行业中(除去盐业),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换句话说,徽商在民国时期并未衰落,更未退出历史舞台。”^⑬还有学者认为:“近代徽商衰落了,这是学术界共同的想法,但是这种衰落是否意味着解体以至退出商业舞台,

^①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诒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

^②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54页。

^③《汪氏统宗谱》卷168,明刊本;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5页。

^④歙县《郑氏宗谱·明故晴轩郑君墓志铭》,明嘉靖抄本。

^⑤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9《望云翁传》,清雍正九年刊本。

^⑥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明处士世鸾公传》,清道光十八年刊本。

^⑦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笃行》。

^⑧戴震《戴震集》上编《文集》卷12《戴节妇家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校点本。

^⑨参见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

^⑩参见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⑪参见卞科《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75页。

^⑫参见[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转引自《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叶显恩《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11章《徽商的衰落》;王廷元、王世华《徽商》第12章《徽商的衰落》。

^⑬张朝胜《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兼谈徽商衰落问题》,《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需要认真分析。大量的事实证明,近代徽州商帮不仅没有消亡,相反的,无论是在徽州本土还是在经营地,徽州商帮依然存在,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近代徽州商帮‘解体’、‘退出商业舞台’之说,值得商榷。近代徽州商帮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事实。”^①

质疑辩难,有助学术发展,值得提倡和鼓励,但质疑辨难以及新观点的提出须建立在对已有观点全面正确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如此,上述两位学者对已有的近代徽商衰落观点的质疑无疑也是值得质疑的。首先,认为近代徽商衰落的前辈资深学者们大多没有近代徽商“退出商业舞台”之说^②,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明确指出:“徽商衰落了,不等于徽州商人消亡了。……‘徽商的衰落’是指这个商帮的衰落,或者说这个商帮主体的衰落,并非说徽州商人都衰落了”,“近代徽州原来的商帮虽已解体,但这里从贾之风依旧不减当年。”^③所以,质疑的学者并没有质疑的事实前提。

其次,明清“徽商”与近代文献中屡屡提到的“徽帮”是不同的概念。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的“早在明代,‘徽’、‘商’二字在文献上就连在一起使用,表明‘徽商’是一个商人群体,也即是一个商帮的名称”^④;这个“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团体”^⑤。即是说,明清徽商是指以徽州地域为中心形成的商人团体。而近代文献中提及的“徽帮”,一是受传统影响的自然表达;二是“近代的徽州商人分散在各地,他们已不是以地域为中心在一起计议结合,相互帮助,而是按行业结成公会借以维护商业中的竞争,于是同行业的商人公所或公会,便代替了原来的同地域的会馆,这样,在近代徽州乃是有‘商’而无‘帮’了。”^⑥即是说,近代“徽帮”是按行业结成的商人团体。正如近人刘锦藻所说:“(徽州)地濒新安江之上游,又当黄山之阴,田谷稀少,不敷事畜,于是相率服贾四方。凡店铺、钱庄、茶、漆、菜馆等业,皆名之曰‘徽帮’,敦尚信义,有声商市。”^⑦也正如质疑者自己所说的“近代徽商在盐业、木业、典

业以至墨业、布业、漆业、酱业、百货业等诸多传统行业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产生过一批著名的商人和商号。这些行业中的徽商也保持了一贯的结帮经营的特性。”^⑧近代徽商这种行业性的“结帮”与明清徽商按地域“结帮”,其性质是不能等同的。因此,质疑的学者并没有质疑的逻辑基础。

关于徽商近代转型的问题。有研究近代徽商的学者认为“徽商研究长期关注于明清时期的徽州商帮,对近代徽商的转型问题缺乏关注……这个现象的产生除了前述‘近代徽商解体论’这一得到学术界相当认可的结论外,还与‘近代徽商落后论’有关。尽管没有学者公开揭橥‘近代徽商落后’的这样的标题,但这样的意涵在相关的著述中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⑨继之,这位学者引用了王廷元、王世华《徽商》中的一段话“当西方商业已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中国的商业仍然植根于封建生产方式之中。徽商的封建性尤为浓厚,他们继续沿着传统的经营方式运作,但求在流通领域内牟利,而不愿投资生产,这样一个封建性的商人团体,处在国内封建政治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之下,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⑩并接着说道:“这段论述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落后的商人团体,又被公认为处于严重衰落中,其近代的转型问题自然难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甚或无人去关注徽商是否有过向近代转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⑪以上论述大致存在这样三个问题:其一,王廷元、王世华在《徽商》一书中的这段论述,是就明清徽商而言的,与“近代徽商落后论”

①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第40、51页。

②仅李则刚先生有此说法。见《徽商述略》,《江淮论坛》1982年第1期。

③④⑥张海鹏《徽商系列丛书·近代商人·序》,黄山书社1996年版。

⑤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前言》,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⑦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13《舆地考九》。

⑧⑨⑩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第190、190、100页。

⑪王廷元、王世华《徽商》,第496—497页。

毫无关系。其二,说“徽商研究者长期关注明清时期的徽州商帮,对近代徽商的转型问题缺乏关注”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早在《徽商》出版的前十年的《徽商研究》中,就明确提到“虽然徽商作为一个封建性商帮……在清光绪中叶以后已经彻底衰落,但有一部分徽商却跟上了时代而发展了商业资本。从民国初年直至解放前,在江南各大城市中,徽籍商人仍然很活跃。……徽州籍的商人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的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①其三,说“甚或无人去关注徽商是否有过向近代转型”,也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早在1996年,张海鹏先生就对徽商的近代转型问题有过精到的论述“徽州商人大多能跟上时代的轨迹在近代商潮中搏浪前进。……事实告诉我们,在徽州的近代商人中,有不少人的经营活动已与‘洋’字接缘。……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商人中已有不少人不是在封建性的商品流通领域里贩进贩出,而是将手中的商业资本投向

产业、金融和房地产业。”^②

的确,相对于明清徽商而言,近代徽商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需要进一步加强;但是,近代徽商的研究必须在全面、准确的了解明清徽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如此,我们才能科学地、系统地去认识整个徽商的发展史、才能为徽商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08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琳琦(1965-),男,安徽枞阳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瑞

^①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663—664页。

^②张海鹏《徽商系列丛书·近代商人·序》。

(上接第113页)回顾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历经千锤百炼的磨砺,造就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徽州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广阔舞台而发展起来的。归根结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所创造的。是高素质的徽州人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大

徽州的广阔舞台,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

(本文为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安徽省徽学会组织编撰的多卷本《徽州文化史》序文,此次发表,略有增删。)

作者简介:栾成显(1941-),男,辽宁营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顾问。

责任编辑:陈瑞